

【回味无穷】

## 踏着麦浪回故乡

□许志杰

初夏的傍晚,满眼都是好看的景。

远处是一片正在由青逐渐金黄的麦田,清风徐来,微澜漾动,夕阳下宛如水天交融的波浪,托着一弦弯月等待着夜幕开启。

小满,这是一个能够给人很多遐想和思辨的节令,很多人在说这是满和不满的最佳契合点,以此比喻人生既要接近于满,还要留那么一点点回旋的余地。我倒没看得如此之远,但仔细去想,小满确是一个设计精到的时令安排,按二十四节气的设置惯例,有小满就应该有大满,大与小是对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小寒过后是大寒,处暑之后是大暑,大雪之前有小雪,唯独小满过了是芒种。先人设计二十四节气有没有注入今人讲得那样深邃的思想内核、人生寓意?不得而知。想来倒也是给人留下无限想象发挥的空间。

在小满和芒种两个节气的一个月里,到底会发生什么?古人真的把节令与人生完美衔接,做出了小满是人生最佳状态这样的正确引领吗?从小满到芒种有倾心欢喜的期盼,播种于去岁的秋,蓄力在寒冷的冬,经历了春,来到成熟的夏天,在万千农作物品种里,麦子是为数不多横跨四个节气,越过隆冬而实现秋与夏隔空相遇的秸秆作物。以物喻人,在自然物种的季节更替中,在金色的麦田里看到了自己越拉越长的影子,触景感叹,又是一年。

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这为一种巧合的自然法则,是麦子自身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四时轮转,风雨雪寒。人不过是遵从这个法则在过着自己的日子。瑞雪兆丰年,顺风顺水,与时俱进,内在的章法根基还在尊重自然。农谚“三麦不如一秋长,三秋不如一麦忙”,点到了小满之后“芒种”的精髓。芒,麦芒也,成熟的麦子才有芒。收完了麦子接着播种,来不及“大满”,新一轮的生长已经开始。

记得快到麦收的时候,母亲总说,小满了,不用半月麦子就熟了。当然,母亲不知道这个小满过后不用半月麦子就熟了的自然现象,并不是一个普遍的地理与气候催生的作物时钟,麦子的成熟期从西往东,或说由内地而往东部沿海地区延展,需要的时间至少有一个半月。显见,二十四节气的设定既照顾到了华夏大地南北东西跨越时空的渐次时差,又尽量缩小了期间的地域异同,小差不大,求大同而存小异。

说起来这也是一个能够超越自然的话题,以物候而喻示人性,昭揭人与自然或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完全有自圆其说的功力。从小满这天开始,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大概每天都会去麦田走一圈,捏捏麦穗的饱和度,估摸一下今年的收成。在机械化使用程度落后的年代,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直处于下风,看天吃饭就要顺天行道,人类不遗余力“怀柔”大自然,祈求风调雨顺的年景带来福祉。我在老家时有一年连阴天,没有抢收下来的麦子几天开始冒芽,已经拉回场院的麦子因为不能及时晾晒而致发霉。生产队的人急得浑身发抖,却束手无策。那时候麦子种植面积少,产量低,还不属于必备口粮,正常年景每家分几十斤麦子就算大丰收了。“虎口夺粮”,生产队长想出的办法是发动社员把麦子背回各自家里,大夏天的用柴火烧炕,把快要生芽或发霉的麦子倒在炕上用文火焯干,保全上交国库的爱国粮。

入夜,看到一列机械化收割机群穿过城市的主干道向西行进——麦客们出发了!我感慨良多,站在路边注目礼。城里人对于麦客释放出极大的善意,没有因为轰隆的收割机占道而予以排斥。和我一起走在村子里长大的伙伴,很多人近些年也做这样的麦客,他们自己或联手几个人凑钱买一台小麦收割机,小满前后西下南去,一路揽活,且干且退,芒种之前正好回来收割自家麦田。问过他们,大概三四个麦收季就能把收割机的成本赚回来。只是麦收实在赶得太紧,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疲惫的劳作也是布满双眼。“麦熟一响”,比喻麦子成熟之快只有一个晌午的工夫。为了赶时间,一台收割机三人轮战,“歇人不歇马”,昼夜不舍,一路向东。麦客像飞来飞去的候鸟,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讯。他们不仅是收割机,还是播种机,又是一粒种子,他们的每一次离开都是下一个丰收季节的开始。或许,刚刚过去的这队麦客中就有我小时候的伙伴,只是没有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身影。此刻,真的很想念曾经的伙伴们,唯愿平安护佑一路,返家有时。

麦客远行,消失在城市的另一端,模糊的视线里映现出很多模糊的记忆。在我离开农村之前,一切关于麦收的记忆都处在纯手工操作阶段。拔麦子,老人们在开拔麦子之前到地里查看干湿。如果地势干裂,拔麦子就非常艰难。经历春夏秋冬,麦根与大地紧密相拥,人要凭一己之力将其连根拔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了解拔麦子之前人们收割的方式是什么,但我理解祖先选择如此笨重又费力的方式,是智慧花开的思辨结果。麦子的秸秆浑身是宝,麦根之所以被保留下来,并非先人没有想到拔麦子之艰辛。在预制建筑材料奇缺的年代,带了麦根的秸秆是房瓦的上好替代品。密实的麦根毛细血管冬天能够抵挡寒风的侵袭,是最好的保暖外衣;夏天抵御风雨水的渗透,滴水不漏,防晒纳凉,冬暖夏凉。拔麦子太过辛苦了,后来改为用镰刀割麦子。变“拔”为“割”,谈不上技术性革命,却完全解放了劳动者的思想束缚。没有拔麦子经历的人不知其苦,知其苦者不知其言,很多人在麦收前就有拔麦子恐惧症,在沉重的思想负担重压下完成麦收的任务,两手长满血泡,腰疼、腿疼、胳膊疼,可谓苦不堪言。割麦子是一次观念与劳动技巧的重大变革,减轻了劳动者的工作幅度与力度,加快了收麦子的进度,缩短麦收时间,保证颗粒归仓,提高产量。人类一直在为解放自己不懈努力,“拔”与“割”的顺势切换,就是一次具有里程碑式的标志性解放运动,向机械化收麦前进了一大步。

一直想麦收的时候回村里看看,体验机械化麦收带来的快感与美感。不知道我小时候的伙伴哪天返乡?这几天城里淅淅沥沥的小雨把我的思绪带得很远,见了上年纪的人就问连阴雨对麦子收成有没有影响?有的说没有,如释重负;有的说没有,心便揪着,祈求这雨快停了,把丰收的喜悦还给我的父老乡亲。电话问我的伙伴,他们说没事,现在全都机械化了,收割机一趟走下来,麦粒归仓,秸秆打包,麦茬翻耕,甚至连夏玉米也能一趟播种完毕。没见过沧海桑田,却经历麦子收割方式的革命,亦为三生有幸矣。

踏着金色的麦浪回家,那是一道何等美丽的风景。心向往之,便是走在了幸福的回故乡之路。

【城市地理】

## 济南国货售品所

□杨曙明

济南国货售品所创办于1933年,它是天津国货售品所为了扩大营业范围,在济南设立的分支机构。这个分支机构下设两个分所,分别是“批发分所”和“零售分所”。

天津国货售品所的创始人叫宋则久,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民族资本家。1899年,宋则久担任天津著名的敦庆隆绸缎庄经理。其间,因为其经营有方,管理得当,绸缎庄买卖兴隆,誉冠全津。但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宋则久经常受到“洋货”的排挤和打压,他痛定思痛,悟出了发展民族经济,必须“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真谛。于是,1905年,他与人合资创办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火柴公司、报国公司;1912年,创办了直隶国货维持会;1913年,毅然辞掉敦庆隆经理职务,接办天津工业售品总所,后改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为民族工业的振兴作了很多有益工作。

售品所开张营业之后,按照宋则久规定的宗旨,不经销洋货,专一经销我国自产的各种工业品,因而深得人心,经营日渐兴旺。

1931年,天津国货售品所指派牛建亭、靳希彭二人来济南推销抵羊牌毛线。经过大半年的推销,牛建亭、靳希彭二人认为,在济南设立批发所很有必要。公司领导商议后,同意了他们的建议。1933年春节过后,公司便继续委派他们二人到济南筹办天津国货售品所之济南批发分所,并拨付资金5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再次来到济南后,牛、靳二人经朋友介绍,租赁了位于普利门保安巷3号的四合院,因陋就简地开始了筹备事宜。同年3月,济南国货售品所批发分所正式对外开展业务。牛建亭担任经理,靳希彭担任司账,王永明担任推销员,另有7名员工。

因为专门经销国货,济南国货售品所的发展可以说是历尽坎坷。开张营业不久,就受到了外国企业的歧视和排挤甚至打压。例如:当时在济南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毛线。一种是西洋货,一种是东洋货。西洋货是英国的蜜蜂牌、学士牌,前者的售价是每磅3元左右,后者是每磅1元8角。东洋货是日本产的樱花牌、海鸥牌,售价都在每磅1元上下。而天津毛纺厂出产的抵羊牌毛线,其花色、质量虽然比西洋货、东洋货稍逊,但因为国货,销路也不错。当英国博德运毛纺厂得知国货售品所经销抵羊牌毛线后,便迅疾派人来到济南,向销售抵羊牌国货的商家施加压力,扬言如销售抵羊牌,他们将不再供应蜜蜂牌、学士牌毛线。迫于压力,有些经销商只好不再经销抵羊牌国货;但也有不为所动,一如既往继续经销。他们认为,商家经销国货天经地义。云寿百货店经理汪志和就是这样一位识大体的爱国人士。他对英国博德运毛纺厂的推销员说:“你们供应我们毛线也好,不供应也

好,我们一定要经销我们的国货。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们,我们更不会屈服于你们的压力。”铿锵有力的回答让外商颇为震惊,更无可奈何。也正是因为这些商家们的大义支持,使得抵羊牌毛线在济南的销量远远高于最初的期望值,国货售品所也由此在济南打开了局面。

上世纪30年代,在济南市场上有一种大华铅笔,因为是中国人在香港设厂生产的,故而被称作“二流国货”。除了大华铅笔之外,市场上还有德国的施德楼铅笔和日本的樱花铅笔。尤其是樱花铅笔,几乎垄断了济南市场。济南国货售品所成立之后,开始推销大华铅笔。当时的市场价格是:施德楼每罗(注:12支为一打,12打为一罗)4元3角,樱花每罗2元1角,而大华则是每罗3元4角。大华铅笔与樱花铅笔相比,既没有价格优势,也没有质量优势,因而推销起来相当困难。为此,国货售品所的推销员们想了很多方法。他们大力宣传“中国人,用中国货”,并通过委托文具店来促进经销。规模稍大的店送5罗,小些的送1罗或2罗,条件是卖出后再付款,卖不出去就退货。当时在芙蓉街上的教育图书社,是济南文具批发经销的大户,初始他们还有些顾虑,只是勉强收下了货品。没想到几天后他们却主动要货,并说:“既然有了我们的国产铅笔,为什么还要推销洋货呢?我们有责任推销国货。”就这样,大华铅笔逐渐在济南打开了市场。

1935年,济南国货售品所的营销活动日渐兴旺,不过,他们只有批发而无零售。为此,天津总所决定再设济南“国货零售分所”。

1938年初,日伪特警强迫国货售品所代销日货,并不得使用“国货”二字。为此,天津总店通知济南分所,将国货售品所更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名称虽改,但仍以销售国货为主,不到万不得已不准销售洋货。此后,他们不仅没有销售日货,反倒是增加了国产的化妆、搪瓷、橡胶、针织等产品,这让日本宪兵大为恼火,多次传讯、警告牛建亭经理,强迫其销售日货,并经常寻衅滋事,不断制造麻烦,殴打国货售品所的店员。在持续不断的重压之下,国货售品所经营每况愈下,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已濒临倒闭。直到1948年秋,济南解放后才又慢慢起死回生,并渐渐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据济南文史专家张稚庐先生回忆,解放初期的济南国货售品所零售分所内,货柜摆设不是常见的沿墙四壁,而是摆设在大堂中间,围绕着货柜是一圈“回”形柜台,其销售的货物是日用百货。

1956年,国货售品所实行公私合营,两个分所的员工分别被分流到济南百货大楼及各大百货商店。当时,鉴于济南百货大楼已经建成营业,为了优化整合且有效利用资源,零售分所的店面便改为珍珠泉理发店。